

李巳生 著

禅密造像艺术精华

(两宋至明清时期)



The Finest Imagery of Chan and Esoteric Buddhism
From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sheng Li



河南大学出版社

禅密造像艺术精华

(两宋至明清时期)

李已生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密造像艺术精华.两宋至明清时期 / 李已生著.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649-0777-8

I. ①禅… II. ①李… III. ①佛像—造像—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K87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645号

责任编辑 朱少雅

责任校对 陈 超

封面设计 翟森森

图片统筹 李寻玉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 编 450046

电 话 0371-86059712(高等教育出版分社)

0371-86059715(营销部)

网 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83千字

定 价 6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祈福行道 解脱治国	11
第二章 寺塔石窟造像	15
第三章 大足北山佛湾石窟	31
第四章 合川涪滩鹫峰禅窟	49
第五章 宝顶山报恩道场石窟	79
第六章 大理国《梵像卷》	139
第七章 藏传佛教造像	155
第八章 筇竹寺五百罗汉塑像	167
第九章 脉络贯通 共创精华	215
后 记	229
主要参考文献	231

绪 言

一

在诸侯争霸、社会纷乱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提出在人生大道上参与或超越的问题，呈现出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的景象。儒家从救世出发，提倡“仁爱”、“仁政”，以孝悌忠信、修己治人为重要的道德精神，强调内心自省，学用知行，兴礼乐平天下。道家主张无为自然，超越生死、善恶、美丑、祸福，以及事物的有无、是非、高下、长短等彼此对立的现象，忘物、忘天、忘己，逍遥自在。《庄子·逍遥篇》中说：姑射之山有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以上所说均透露出先哲们为解决事物的两极矛盾，参与或超越现实，向往天下太平和自由天地。这些学说对后来的道教和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相互交融中共同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此时民间巫师传承“方仙道”，已有服食、导引、房中等方术，东汉张陵采取“黄老之学”，结合巴蜀“五斗米道”，创立了正式的道教——“天师道”¹。



老子像

二

今考古工作者在四川乐山、彭山、绵阳等地的东汉岩墓中，发现了雕刻在明堂门额上或摇钱树座上的佛像（或一佛二菩萨像），以及雕刻在画像砖上的神仙、忠臣、孝子传说故事等。如雕刻在乐山麻濠东汉崖墓中的佛像，虽形象模糊，但是佛着通肩衣，圆形项光，高肉髻，右掌心外扬似作说法印等佛像特征已经显现。雕刻佛像的门楣上共造三像，正中为铺首，左右分别刻佛像及垂钓者，符合墓室造像镇邪祈福的内容。乐山麻濠崖墓门楣上的佛像和彭山崖墓中出土的摇钱树座上的一佛二菩萨像，都应是佛像。佛教传入中土后，延熹九年（166）汉桓帝于宫中“设华盖以祠浮屠”，襄楷上疏述浮屠之

¹ 道教起初是由各地区各民族的巫师所传承的地方方术结合形成，故初名“方仙道”。战国时期方仙道形成了服食、导引、房中三大派。两汉时期尊奉“黄老”，合黄帝《内经》与李耳《老子》为“黄老之学”。东汉张陵在四川青城山的山谷改造“五斗米道”，正式创立了道教。（王家佑：《四川道教摩崖造像概述》，载《中国美术全集·四川石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旨。建和元年（147）安息国精研阿毘昙的安世高，修习禅定来到洛阳，以禅法典籍为主译经讲学。他将天竺的“持心习禅”与中土“黄老之术”兼融。在他看来掌握道教修仙求相的禅法，就可以“制天地”、“能飞行”、“断生死”、“住寿命”、“存亡自由、大弥八极”¹。北魏文成帝（440~465）大规模凿窟造像，邀请凉州沙门昙无讷赴平城，于武周山开凿云冈石窟，广聚沙门，同修禅法。魏晋时出现了用老庄学说阐明佛教义理的“格义佛教”。东晋时，支道林以佛教解《庄子·逍遥篇》，后慧远致力禅观，祈



彭山汉墓一佛二菩萨像

向净土，又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说儒、释、道之异同，认为“道法与名教，如来与尧舜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则期同。”北齐时，河南邺都近邑名僧云集，佛陀扇多住持少林寺，其弟子僧稠于天保六年（555）凿安阳小南海石窟，窟中雕“比丘僧稠供养”像，设卢舍那佛、阿弥陀佛、弥勒佛及诸弟子菩萨等。壁面雕西方净土、莲花化生童子图。窟门侧镌题“华严经偈赞”、“大般涅槃经圣行品”。邺都僧道场讲《智论》，传持阿弥陀佛52菩萨像，供禅定观想修菩萨行，经52阶位达到“妙觉”极位。今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川石窟及日本法隆寺金堂等处都遗存有造像，显示出多彩的风格和相互交流的影响。武周至开元年间，在四川地区造像中有数十莲茎出自阿弥陀佛宝座下的莲根处，开放的52朵莲花上各坐一菩萨。龙门石窟万佛洞、敬善寺等



乐山汉墓佛像

窟中，52菩萨分别浮雕在正壁或左右壁面上。四川阆中四面龕上雕刻此图，卢舍那佛、弥勒佛及千佛与小南海石窟供养的三身佛名号相同。河北武安县僧稠禅师寺设有多间禅室石室及禅棚。敦煌北魏石窟中心塔柱上，也有四面开龕，雕刻说法、禅定、苦修像。西魏第285号窟四壁画有35个和尚于深山禅窟中坐禅苦修，南北壁数间小室可能是供僧人坐禅的禅室。坐禅闭目冥想，无限美化佛陀及西方极乐世界，同时丑化自身不净和人世的痛苦，依靠佛陀之力得以解脱。

印度禅法盛行之时，基于老庄思想和佛教般若、中道义理的，超越两极对立、不执一端，探求内心、见

1 《安般守意经序》，载《出三藏记》卷六。



关中四面龕



洛阳龙门石窟

性成佛的中国禅宗已逐渐形成。东晋僧肇出家之前已习读儒家典籍及老庄之学，他研习《道德经》、《维摩经》，互递传讲，提出“体用一如，非无非有，即动即静”之说。齐梁时宝志修习禅业，传世《十四科颂》、《十二时颂》，提出：“菩提烦恼不二，生死不二，迷悟不二，真伪不二，解缚不二，境照不二，运用无碍等。”¹与之同时付大士作《心王铭》，主张自观自心，知佛在内，不向外寻，即心即佛，明心识佛，晓了识心。又说：“空中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²“付大士见梁武帝时，披衲（僧衣）、顶冠（道冠）、鞞屨（儒屨）。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士以手指鞞屨；帝问：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在南怀瑾先生看来，此时付大士已表示出中国禅宗的法相是“以儒为基，道学为首，佛学为中心的真正精神”³。

梁普通年间（520～527），南印度菩提达摩经海路到江南见梁武帝，后游嵩山少林



大同云冈石窟

1 《指月录》上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24页。

2 《指月录》上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7页。

3 南怀瑾：《南怀瑾著作珍藏本》第五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石恪画六祖砍柴图

寺，坐禅观壁，说“二入四行”、“专注一境”、“罪福之宗两舍”，其徒有慧可、僧桀等。后僧桀弟子道信在黄梅双峰山聚众，白天劳作，晚间坐禅，达30年。唐初道信弟子法融（594~657）钻研《华严经》、《维摩经》、《法华经》，著《绝观论》，提出“以心为体”、“以心为宗”、“以心为本”，居牛头山开牛头宗。而道信的另一弟子弘忍（601~675）居黄梅之东山，发挥《金刚经》般若义旨，创东山法门，主张“动乱无二”、“语嘿恒一”，解脱在于我之内心，不依靠外力，提出身、口、意三业，行、住、坐、卧四仪皆是道场。弘忍主张学佛不在于寺院，而需贯穿于日常生活中。

慧能学于弘忍，破柴、踏碓，却做偈惊众，付与法衣为第六祖。他“虽曾学于弘忍，然后实在南海印宗法师处出家，相传门徒法海据其言行录为《坛经》。此经影响巨大，实于达摩禅学有重大发展，为中华佛学之创造也。慧能之学说要在顿悟见性，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¹。慧能的《坛经》以否认天神创世之说的释迦牟尼为首传，认为一切佛法尽在自心中。提出随缘任运，不执一端，超越事物两极对立的矛盾。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即暗，以明显暗。来去相因，成中道义。慧能集中国禅宗思想之大成，之后历唐、五代及宋，分宗立派。其弟子神会建荷泽宗；怀让、道一建洪州宗，分支为伪仰宗、临济宗；行思、希迁建法眼宗、云门宗、曹洞宗。禅宗思想及修禅方式随之发展演变，出现



梁楷画二祖调心图

“机锋”、“棒和”、“绕路禅”、“看话禅”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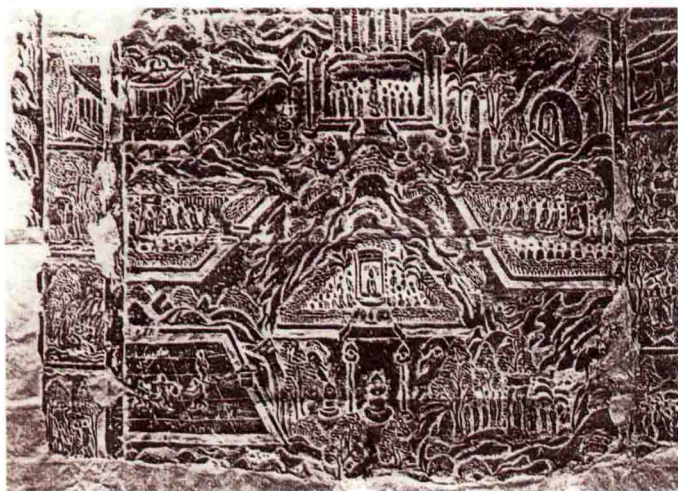
安世高翻译印度禅法典籍，东汉支谦译出《华积陀罗尼神咒》，东晋帛尸黎密多罗译《孔雀王咒经》，此后天竺居士竺兰提译《请观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为“杂密圣观音法，密教经典诸尊法的嚆矢”²。成都商业街出土以观音为主尊、胁侍菩萨及天

1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记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8页。

2 密教辞典编纂会：《密教大辞典》，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9年版。

王龕像，镌题“齐建武二年岁次乙亥荆州道人释法朗为七世父母师徒善友造观音成佛像一躯，愿生生世世永离三塗八难之苦，面请诸佛弥勒三会”。成都万佛寺藏龕像上镌题“中大同三年敬造官世菩萨一躯，明口天游神，净土口口兜率供养口佛”。龕背面浮雕弥勒佛坐莲花台上，疑此二龕依密圣观音法造像，¹显示出崇高与怪异、中国线描与天竺凹凸法相交融的风格。²

魏正始八年（247）康僧会至建业传法译经，传播“禅学”和“因果业报”。被后世誉为“佛画之祖”的曹不兴摹写康僧会携来佛画仪范，创“曹衣出水”的风格，“变夷为夏”。东晋戴逵造无量寿佛像，古制朴拙，不足动心，潜坐帐中，密听众议，积思三年刻像而成，为“百工所范”。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被誉为“南朝三杰”，在描绘



万佛寺弥勒下生经变（五世纪）



万佛寺观世音菩萨龕

1 南朝齐梁忏法盛行，以观音菩萨为本尊，依经请观音，诵密咒，消除伏害毒。成都万佛寺和商业街的两龕观音造像，均与观音为本尊，涉及“兜率”、“弥勒三会”建人间净土。观音弥勒并奉，显密相涉，含杂密造像色彩。（李已生：《四川密教造像初探》，载《中华佛学学报》第19期，第408页）

2 在成都万佛寺齐梁造像上显示出笈多时期秣菟罗派艺术和中南半岛的影响，既着意刻画超凡出世的精神状态，也重视肉体美的塑造，显示出怪异的色彩。印度笈多王朝时，大乘佛教开始转化，与印度教交融。法显在《佛国记》中说，沿途未见有正统佛教：“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佛祖统记》卷37）东南亚扶南（今柬埔寨地区）在东晋末年已传入婆罗门教，及其他一些外道，即将大乘佛教和湿婆崇祀结合在一起（《南齐书·扶南传》），天竺及东南亚显密造像不免给南朝的造像染上奇丽神秘的色彩。成都万佛寺康胜造释迦立佛像，显然是以笈多式佛为范本，有的菩萨配华丽的璎珞，薄衣贴体，扭身耸臀，似为5世纪印度阿旃陀石窟第17窟中女神妖冶的风姿。观音座下的伎乐舞蹈扭头、弯腰、屈膝、一腿直立、一腿横斜的动态，犹如扶南、占婆地区的舞姿。在造型技法上张僧繇善用天竺凹凸画法，利用色彩和透视关系，在平面绘画上呈现出立体感。顾恺之、陆探微变密体为疏体，“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笔才一二，而象已应焉！”（李已生：《成都万佛寺齐梁造像艺术特色的形成》，载《敦煌研究》1992年第3期，第90页）



鹿野苑初转法轮



广元千佛岩毘卢佛窟

人物形象时，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陆探微的画秀骨清像，张僧繇的画面短而艳，其与西域传来的唇厚鼻隆、挺然丈夫的佛像呈现在同一窟中。他们在佛教造像艺术上的创新，标志着佛画开始中国化的进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造像艺术在中国佛教美术史中呈现了巍峨的高峰，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石窟，雄伟壮观，令人惊叹。

唐初，玄奘、义净返长安，所带译经含有密咒。永徽二年（651）阿底瞿多据《金刚大道场经》撮要抄录成《陀罗尼经十二卷》。诸佛菩萨释迦、无量寿、弥勒、观音、药师、地藏、金刚力士以及诸天王各以自身性轮身、正法轮身、教令轮身，分别列入曼荼罗图中。武则天崇佛道，重瑞应，符瑞图忏，秘密之风盛行。阆实叉难陀来长安，译出《华严经》80卷本，后神秀禅师、慧安禅师入禁中礼拜向道。“载初元年（690）沙门怀义、法朗等造《大云经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¹届时上下造卢舍那佛、弥勒佛之风盛行。

唐玄宗时开元三大士来长安，系统翻译密教经典，设坛灌顶禳灾祈福。一行大师拜普寂禅师为师，落发出家，后译密经，阐明义理，发扬世出世间的精神。唐代画塑名家辈出，这一时期的造像雄健绚丽，异彩焕发，别创新风，为五代两宋之楷模。然而，这一时期所造密像东传日本、中原地区并不多见，至今仅敦煌石窟、四川广元、巴中石窟及蒲江、邛崃、丹陵等地遗存大量密坛。其遗留的曼荼罗图像精美绝伦，可谓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高峰。

四

赵宋王朝自宋太祖立国起便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并力促经济的发展。在南

¹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9页。

方，宋朝与大理、吐蕃维持较安定的局面；在北方，其与辽、金、西夏、蒙元诸政权对峙互动，时战时和。同时，朝廷派使臣远通域外，与诸国友好往来，使其经济、文化进入一个伴随着社会动荡的开放的多元交融的大繁荣时期。当时北方丝绸之路甘肃通道属西夏政权势力范围，而南方丝绸之路经中南半岛或南海交通无阻。北宋开辟农田、兴修水利，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南渡后，经济在南方富庶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活字排版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促进了经济、文化的腾飞。指南针与罗盘装置在巨型的海船上，远通东南亚以至非洲诸国，蒙古骑兵穿越草原、沙漠，开辟了通往欧洲的商道，海陆贸易给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北宋汴京“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¹。正值大朝会，诸国使人入贺，“其大辽使人在都亭驿，夏国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纥、于阗在礼宾院，诸藩国在瞻云馆或怀远驿。”²金人入侵中原后，朝廷南迁临安，南方经济和文化仍持续上升，甚至超过北方，临安的繁华不亚汴京。杭州大街买卖昼夜不绝，茶馆、酒楼、药铺张贴绘画成风。“贾似道更是大修园馆，生活奢侈惊人……园池声妓服玩之而甲天下。”³寺院林立，造像艺术蓬勃发展，佛经佛画作为商品开始流通，深入民间市井作坊、庙会市场。绍兴府城外开元寺庙会，“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佑皆集，玉帛珠屏名香珍藏，组绣、髹簾之器山积云委，炫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器物亦间出焉”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铜、铁货币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成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宋王朝不惜割地献银称臣，忍辱苟安，临安城中达官贵人、富商豪贾，依然沉醉在所谓太平盛世的秦楼楚馆、莺歌燕舞的享乐中。南宋诗人林升在《题临安邸》中感叹：“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朝政日益腐败，三纲五常也为之动摇，朝廷官员贪污成风，上下交争利，国库空虚，赋税加重。豪门夺走农民土地，贫富悬殊日益扩大。为挽救危局，新旧党争排除异己，直言的士大夫苏轼被流放海南边地，画僧法常抨击奸相贾似道也被追捕，主张抗敌的高僧宗杲被免去僧籍，流放衡州。当蒙古大军逼近临安时，贾似道仍然日肆淫乐，凡上奏边关事务的人均被训斥。德祐二年（1276），蒙军进入临安，赵宋王朝的统治彻底结束。

宋朝设图画院，罗致天下名家画士，画新样于大相国寺，元丰中昭试天下画工，特

1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97页。

3 傅斯年：《南宋时期的绘画艺术》，载《中国美术五千年》，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4 陈耆：《本堂集》卷八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奉元本心枢密书》。

招翰林，畀以官禄。辽、金、西夏、大理也设有专门的画院机构，涌现出不少杰出的本民族画家、雕绘巧匠，并在佛教造像上崭露头角。宋朝时绘画艺术在创作思想和技法理论上提出新说，重视写心传神，探求艺术的创新和多样化。宋画院提出画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行色俱若自然，笔以高简为工。士大夫作画随心写意，市民多喜爱写实如真，绘画向雅俗两方面发展。与此同时，佛教造像者常访求名家画样又彼此兼容，雅俗共赏，展现出一代新风。“宋人辉煌的文化成就和富庶，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权都难以匹敌的。”¹

两宋时期文化经济发展超越隋唐五代，跃居世界前列。其间，印度晚期密教传入，佛教禅宗鼎盛，显密诸宗相涉，三教合流，迅速在中原及南北民族地区广泛传播，遂即产生了复杂的派系。禅宗高僧智圆、嵩契、宗杲等与士大夫张商英共唱佛儒交融、三教合流、行孝忠君护国。南方的大理和吐蕃在唐时传入的佛教基础上继续发展。大理国阐瑜伽教，崇奉“梵僧”、观世音菩萨、禅宗六祖。吐蕃在藏王朗达玛灭佛后，从西康传入密法，又邀请阿底峡、护法等入藏，译出新经，行“三士道”，由显入密成佛，又以“无上瑜伽法”为修行最高境界。北方辽、金、西夏、蒙古，在与汉地交往中接受佛教信仰。辽得宋蜀版大藏经后，又增刻《契丹藏》，觉苑、道颐均据《华严经》与园教思想融合密义。金入汴京之前，有杨歧派克勤住持天宁寺，弘扬禅法，之后又有宝严、万松其秀、知玲、祖朗分别治禅，华严、净土、居士李屏山说三教合流。西夏王朝多次向宋乞赐《大藏经》，用西夏文翻译。慧克著《密咒园音往生集》，使之与念佛结合，请



大足宝顶山教相道场局部

1 [美]韩森著，梁侃、邹劲风译：《开放的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页。

回鹘僧演译佛经，又邀吐蕃僧携经像传播佛法。元世祖忽必烈崇奉吐蕃密教，尊吐蕃名僧帕克斯巴为国师，之后加号为“大宝法王”，建大护国仁寺，遣瀛国公赵显学佛于吐蕃，更求造梵王佛像奇工，邀请尼泊尔阿尼哥及其汉族弟子刘原大造梵像。

这一时期造像艺术专尚法度，务求形似与不仿前人随心写意并行互补。密教译出新经，禅林行禅创新，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影响，内容出奇，形式新颖。从辽朝寺塔塑像、敦煌石窟西夏壁画、金代寺院壁画、大理画卷、吐蕃造像到南宋重庆地区大规模凿造的禅密石窟造像群，都可见南北民族之间在艺术上的交流融合，以及其在印度、尼泊尔、爪哇、黑鹳、西凉等外域的影响下另创新风。

五

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国，其后人南下灭金、西夏、吐蕃、大理和南宋，统一全国，建立东至鄂霍次克海，南到西藏、云南，西达新疆，北抵西伯利亚的元朝。虽元初出现短暂的经济衰退，但很快农业、商业逐渐得以恢复，官营手工业发达，对外贸易繁荣，泉州成为当时最大的海港。元朝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将国民分为四等人，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三等是汉人、四等是南人，蒙古人享有特权。元世祖死后，蒙古贵族及官员搜刮民财，贪污贿赂之风盛行，阶级矛盾急剧激化，最终爆发农民起义，元朝统治被推翻。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减免赋役，整顿吏治，严惩贪污。明成祖朱棣北征鞑靼、瓦剌，巩固边防，扩大对外交往，派郑和七下西洋，明朝呈现出吏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明中叶时国力由盛而衰，嘉庆帝信用方士，专心修道，妄求长生。万历帝更是纵情声色，昏庸无能，加之宦官专政，吏治腐败，皇室、官僚、地主掠夺农民土地，致使农民起义爆发。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很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朝建立，定都北京。清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恢复了衰败的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日益达到高峰。清朝自诩“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国交往，同时也为了避免外敌入侵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向帝国主义列强割地赔款、开放通商，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禅僧敬安爱国忧民曾拜会孙中山先生，太虚大师倡导人间佛教，走向共和。

元代推行喇嘛教佛道禅密并奉政策。元代明本（1263～1323）认为：“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济之心也，教宗乃阐一佛大智开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庄严之心也，禅宗乃传一佛大觉圆满之心也。”¹明代禅僧清可说，我得仲尼之心而窥六经，得伯阳之

1 杜继文：《天目中锋和尚广录》，载《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页。



筇竹寺天台来罗汉降魔图

心而达二篇，得佛心始了自心。《紫阳真人语录》记：“我不异人，人心自异。人有亲疏，我无彼此；水陆飞行，寺观一体，贵贱尊卑，首足同己。我非我，何尝有你？彼此俱无，众泡归水。”¹元代画家颜辉画《刘海蟾》、《铁拐仙》、《水月观音》等道释人物，任仁发画《张果见明皇图》，山西永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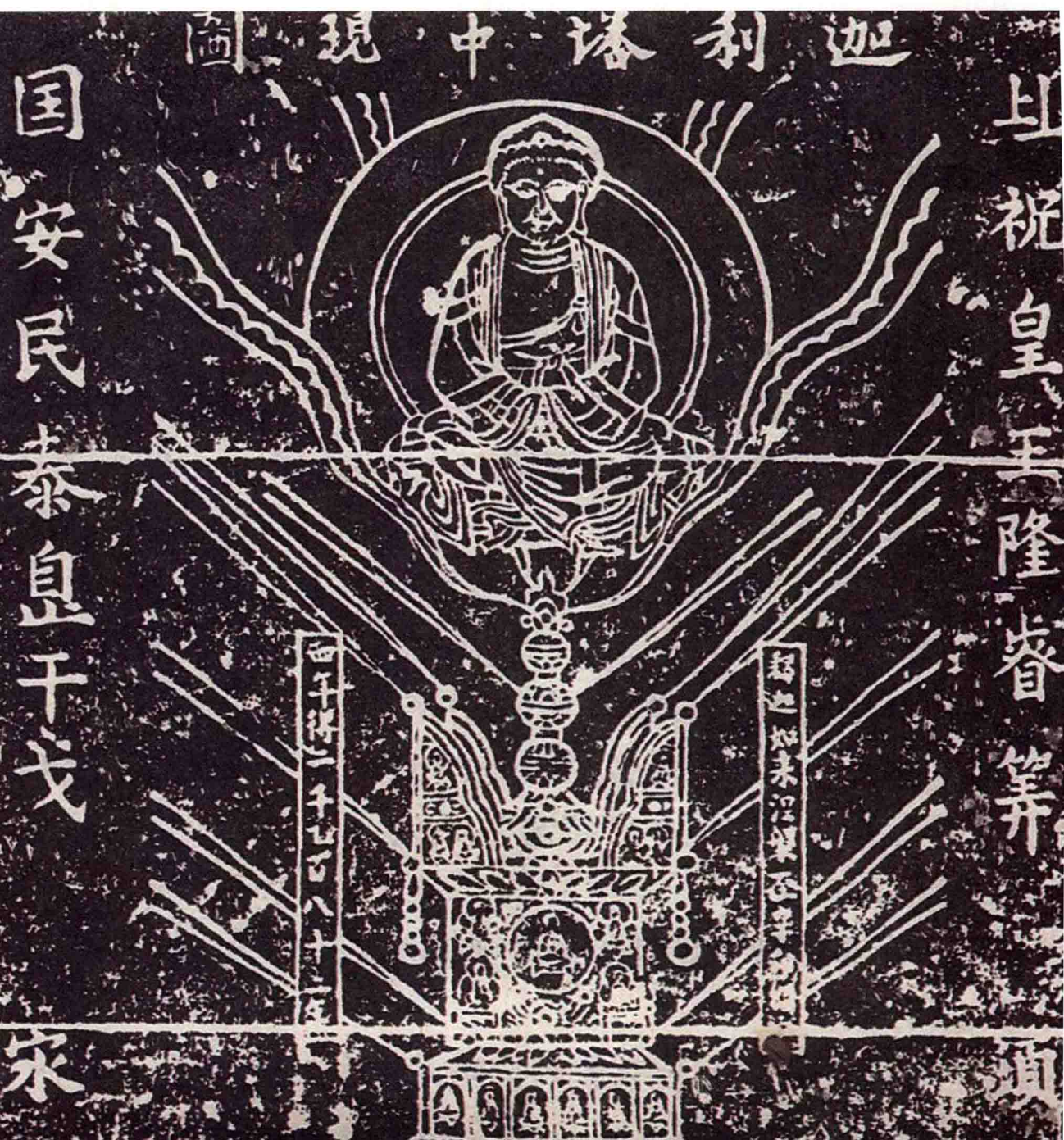
宫壁画道教天尊神仙和八仙图。明代丁云鹏画道释人物，陈洪绶画《九歌》、《水浒传子》。清代除流行画道释人物外，还有大量以民间生活为主题的风俗画，如黄慎的《群乞图》、姚文瀚的《卖浆图》、朱炎的《群盲图》，与此同时，此类人物也进入佛教造像中。随着西洋造像和油画的传入，肖像画逐渐为人所接受，丁皋著《传真心领》、《写真秘诀》，民间画工也有写真口诀，在形象上追求写实如真。佛、儒、道人物及民间俗神300种都纳入民间全神中。各民族地区的雕塑匠师的造像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深受其影响，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群像更是这一时期造像艺术的精品。

印度佛教自传入中土后，便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交融中发展演变。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新疆一带的魏晋以至隋唐的造像艺术早已闻名世界，载入史册。两宋至明清的造像随着近百年考古工作的深入，涌现出不少造像精品，并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1939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4位学者入四川考察；1947年梁思成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以《唐宋雕塑》、《建筑发现》为题演讲，首次介绍了大足石窟；1945年陈习删主编的《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付印，刊载了唐宋遗存石刻章节，迎来中国学典馆杨家骆等15位学者组团考察大足石窟并发表论文于重庆、台北；1949年全国开展文物普查工作，文化部及中国美术家协会先后组团考察大足及麦积山石窟；1954年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开始结合教学，组织学生及老师到大足石窟进行学习、研究，编辑出版《大足石刻》图录；198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1985年《中国美术全集》60卷出版，之后相继出版了规模更大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从原始社会至封建社会，历代美术发展演变的光辉灿烂的成就。其中两宋至元明清时期造像艺术不断中国化、世俗化，是继隋唐之后出现的又一座独具特色的艺术高峰，迄今遗存不少禅密造像艺术精品，为中国美术史的丰富和完整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 [清]乾隆：《御选语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第一章

祈福行道 解脱治国



释迦牟尼宣讲一切众生平等，每个人都可依靠自己的觉悟修行，解脱苦难达于涅槃，鼓励弟子用通俗的语言对其教义进行口耳相传，反对使用占据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梵文。早期佛教造像的佛座上无佛像，只是浮雕有佛说法时的双脚印和菩提树。阿伦迦王时始建塔藏佛舍利，凿石窟，造佛像，集结僧侣讲传佛经，并派遣僧侣传法四方。

佛教典籍浩瀚，文意艰深，但造型艺术可以通过直观感受，跨越时空表情达意。自佛教传入中土，依经造像传播，举凡可以造型成像的石、木、泥、金属或笔墨书画无不充分利用，名士奇匠尽心竭力地造像供奉礼拜，修禅观象，祈福禳灾，传法行道。宋太祖立国，尊儒崇佛。建隆元年（960）先度童行八千之后，又派遣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设译经院译出新经，诏令益州雕刻大藏经版。雍熙元年（984）敕造罗汉516尊，置天台寿昌宫。天禧元年（1017）宋真宗大会道释于天安殿凡13086人。

两宋时期，南北民族地区统治者无不以倾国之力倡导信奉佛教，大造佛像。西夏在沙州、甘州建寺凿窟、画壁塑像，以求“浮图安邦”。大理“岁岁建寺”，铸铜万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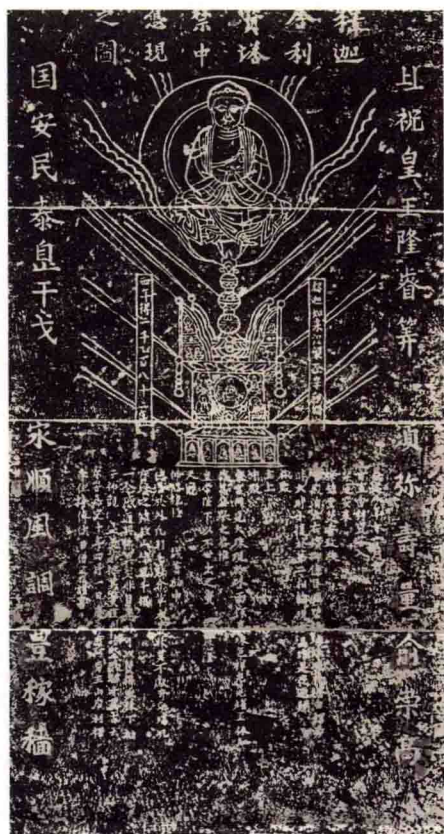


《梵像卷》礼佛图

《梵像卷》题跋说“描诸圣容以利群生”。佛教宣说慈悲为本，主张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每逢战火弥漫之时，“观音拔苦”、“弥勒施乐”的信念就会以迅猛的速度深入民间。宋地农民起义多以“弥勒佛下生”、“均贫富”为口号。建炎至绍兴年间（1127~1162）的大足北山石窟中就有施主在造像题记中乞求“干戈永止”、“皇封永固、夷夏相安、人民快乐”。蒙古大军窥视四川时，大足僧赵智凤以瑜伽教居士柳本尊为教主，建立大规模的宝顶山道场造像群宣说行孝忠君护国。在两宋时期的300年中，南北民族地区与汉地的佛教造像，诸如辽金西夏寺院塑像，南宋大足北山、合川禅窟，宝顶山石窟雕刻，金代以及大理梵像卷等都呈现出前所罕见的佛教造像艺术的奇观。

元明清时期吐蕃喇嘛教进入汉地，继两宋显密相涉、诸宗归禅、三教合流的大方向，和修禅不执一端、自我解脱，并参与社会安危、救世济民的精神相结合，对儒佛道采取兼融并收的政策，加强政教合一的治世之道。

元末明初禅宗高僧楚石梵琦（1296~1370）倡导悟道、脱俗、出世，随缘放旷，任性纵横。他在奉旨于蒋山禅寺水陆法会升座时，首先祝词报皇恩，“后又召师说法，赐



宝顶山灌顶坛毘卢庵佛舍利禁中应现图



清内蒙古三娘礼佛生活图